

中国名,外国味

事实上,开埠之初的上海,并没有多少中国人能够耳熟能详的地名和路名。从1845年起,英国人首先沿着黄浦江两岸和吴淞江(俗称苏州河)南岸建立起旅沪外商居留地(后称英租界)。紧接着,美国人沿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建立美租界。再往后是法国人,从1849年起,以洋泾浜为界,在今天延安东路以南一侧拓建法租界。到1862年,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,与法租界并立。这两个租界的扩张与巩固,无不以修筑道路为依托,层层推进,逐次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。

英国人最早登陆的地方,是黄浦江畔的江边大道,又称黄浦滩和外滩,今天的正式名称是中山路,其西文名称“Bund”并非英文,而是英属东印度公司所用的印度斯坦语,即“江边堤岸”。同清政府签订土地章程后,南京路便是英国人向上海纵深推进的第一条路,其东端原系英商麟瑞洋行大班霍克为跑马修建的小道,以连接英租界最早的界路(今河南中路),当时叫派克(Park)弄,又叫花园弄。以后几经延伸,路面铺垫碎砖石碾平,可供马车奔驰,直达今天西藏中路附近新建的跑马场,遂被称作“马路”或“英大马路”,俗称“大马路”。此路后来再向西,越界而筑,直至静安寺,时称涌泉路,路名源自静安寺内一口沸井,井下涌泉如沸。后来,涌泉路改称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。

1865年,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次对界内道路进行命名。耐人寻味的是,他们赋予英大马路的,竟是十分中国味的符号“南京路”,其灵感源自1842年不平等的中英《南京条约》,正是从这个条约起,英国人获得在华五口通商的自由,获得建立居留地的特权。按照类似的思路,公共租界的首批道路都被贴上中国标签,像南京路以南的九江路、汉口路、福州路,依次排开,清一色的中国城市名,替代原来的俗名二马路、三马路、四马路。可是到了五马路,命名规则被打破了,跳出一个“广东路”,广东乃省,非市,为什么?有人分析,这是因为英文“Canton”兼有“广州”和“广东”之义,极易混淆,以致成讹。如果按照设计者初衷,应叫“广州路”才对。

这些道路的命名看似忽东忽西,毫无规律,其实大有深意。公共租界主导方英国选用的城市名,无一不是强迫中国清政府开放的通商口岸,那里都有英国势力盘踞,如此命名,看似“入乡随俗”,实际却是“鸠占鹊巢”。

至于南京路以北诸路,统称“后马路”,依次为天津路、宁波路,也都是通商口岸;再次是北京路,北京是清朝帝都,统御各地,其名号理应“出场”。上海开埠前,北京路本是通往江滨的四条土路之一,正式开通后,因其寓意阔大,因此俗称“后大马路”。

外滩以西,与黄浦江平行的南北向道路,租界则以中国省份命名,从四川、江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福建、浙江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,直至西藏,这些地方或多或少都有英国人的势力范围。

租界当局开筑路时,将道路宽度定为20-25英尺(1英尺合30.48厘米),到1863年,放宽为40英尺,这是为什么呢?当年,英式双驾马车的马臀宽度为4.85英尺,合147.5厘米(也是现代铁路的标准轨距),马路宽度20英尺以上,恰好符合双向四车道的通行需要,至于以后放宽,自然是为了提高道路通行的安全度与舒适度。

经过讨价还价,到1848年,清政府签租给英国人的地皮从830亩扩张到2820亩,大体圈定在今天中山路、延安东路、西藏中路、北京东路之间的范围内。需要强调的是,英租界的东端,并非直抵黄浦江,而是止于沿江大道。多年来,由于粮船往返,浦江西岸被纤夫们踩出一条牵道,这条牵道经不断修整加筑,俨然成了正式道路,如果租地的东端标明是黄浦江,势必连牵道一并出租,无疑给今后华人江上行船带来隐患。所以,租约里故意不写黄浦江,这是当年负责谈判的清朝上海道台官慕久采取的小策略。

英租界核心区确立后,仍不满足,还在得陇望蜀,寻求扩张,越界筑路便是其拓地的重要手段,但以后开辟的新路,中国味就越来越少了。

点缀老上海的老路名

◆ 弄非

南京路、北京路、西藏路……,初来上海的游客想要找寻上海路名的命名规律,却不能如愿。爱多亚路、福煦路、贝当路、马斯内路……,接触上海历史的朋友碰到这些奇特的上海路名,也想打听些来由。

上海中心城区的道路,除开在南市老城厢的部分,多数形成于近代开埠以后,由租界当局命名,因此普遍烙上了异国文化痕迹。那些既拗口又冗长,且不符合中国人言语逻辑的“洋味路名”,具有较高的识别度,已经成为旧上海历史风尘的一部分。



■ 19世纪80年代南外滩



■ 1848年上海道台麟桂发布法租界界址告示



■ 十九世纪后期上海外滩江边大道



■ 1908年法租界为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)铺设电车轨道



■ 1914年英法租界开工填埋洋泾浜,修筑界路,1915年底建成,命名爱多亚路(今延安东路)



■ 20世纪30年代的敏体尼路(今西藏路)



■ 1925年后建造的法国总会,今茂名南路(旧名迈尔西爱路)58号

元首大名“站马路”

欧洲人偏好以人物来命名市政设施和建筑物,上海开埠以后,同样的癖好也被移植过来,成为舶来的文化符号。

1849年,英法两大租界以洋泾浜、长浜为界,各建势力范围,这两条河浜经过多次填埋,变成了爱多亚路(今延安东路)和福煦路(今延安东路)。其中,爱多亚(今译爱德华七世)是英国国王,1901-1910年在位,在其任内,力主与法国结成协约国联盟,共同对抗欧洲新强权德国,奠定了英国在20世纪初的外交方略。

除了爱多亚路,用君王命名的道路还有亚尔培路(今陕西南路)和爱麦虞

限路(今绍兴路),前者是比利时国王,后者是意大利国王。而用总统名号的则有林肯路(今天山路)和杜美路(今东湖路),林肯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总统,他以解放黑奴闻名于世,而杜美(今译杜梅尔)在1931年当上法国总统,次年却遭暗杀。说来也巧,杜美路本身就十分短,仅474米长,但沿路建筑富丽华美,科学家爱因斯坦于1922年访问上海,曾下榻杜美路上的犹太富商加登的寓所,并在其花园演讲自己的相对论。

让人奇怪的是,法国历史上最有名的“太阳王”路易十四,法租界却没有一条道路为其彰名。

拿中国道路“送人情”

欧洲列强崇尚武力,积极对外扩张,拿军事统帅命名道路,也是一种文化时尚,落入其手的上海租界也不能免俗。

拿法租界而言,名气最大的无疑是三条“元帅路”。前文提到的福煦路得名于法国元帅福煦,他是一战期间的协约国总司令,在1918年击败德国名将鲁登道夫,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。继福煦之后,一战中另两位法国名将的大名也“落户”上海,那就是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)和贝当路(今衡山路)。

霞飞是一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,因在1914年顶住德军对巴黎的进攻,受到国人拥戴,法租界遂于次年将原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。1922年,霞飞来沪,亲自在这条路上走了一圈,1943年,霞飞路改名泰山路,1945年改名林森路,1950年5月改为延安路现名。至于贝当,是一战凡尔登战役的关键人物,他不顾一切地守住阵地,重创德军,1922年贝当路建成,正当其鼎盛之时,没想

到这个“法国英雄”却在二战中当了德国人的傀儡,最后落得阶下囚的下场。

法租界还有一条用英国陆军元帅命名的道路,那就是海格路(今华山路),此人今天通译为“黑格”,系一战期间支援法国抗德的英国远征军司令,他在英国士兵心目中形象很差,总爱用“人海冲锋”去撞德国人的机枪,让多少英国妇女变成了寡妇。当然,不管黑格用兵水平高低,毕竟是一位“国际主义战士”,法租界用路名来表达自己的敬意,只不过平白拿中国的道路做了人情。

1914年,法租界向西扩展,取得大片新租地,公董局遂填埋南长浜,将今天重庆南路至瑞金二路之间的一段打通为路,命名为辣斐德路(今复兴中路)。辣斐德,听起来很陌生,可换做今天的译法“拉斐特”,恐怕知道的人要多一些,这位法国将军曾在18世纪末率部远征,支援美国独立战争,后来又参加法国大革命,堪称“军中名人”。

名字中的“文学气”

一般而言,上海租界当局喜欢用欧洲名人为道路命名,包括驻外使节、神甫、文化名流等。其中,以文化名流命名的道路,在法租界有莫利爱路(今香山路)、高乃依路(今皋兰路)、马斯南路(今思南路)等。莫利爱,今译莫里哀,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奠基人、喜剧作家和演员,代表作有《伪君子》《吝啬鬼》等。高乃依,法国剧作家,代表作有《熙德》等四大悲剧。马斯南,今译马斯内,法国作曲家,歌剧代表作《黛依丝》中的沉思曲,脍炙人口。

今天上海音乐厅以东,有一条小马路叫龙门路,原名麦高包禄路,听来有点耳生。其实,麦高包禄就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的另一种音译,关于他在中国元朝游历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。而环龙路(今南昌路西端)是以法国早期飞行家环龙命名,此人在中国举行过多次飞行表演,不料“马失前蹄”,竟于1911年5月在上海江湾跑马场表演时坠机身亡,死后葬于由法国兵营改建的顾家宅花园,时称法国公园(今复兴公园),并立碑纪念。